

## ·藏书家与藏书楼·

## 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

陈 东 辉

温州瑞安的玉海楼与宁波的天一阁、湖州南浔的嘉业堂并称为浙江三大著名藏书楼。与天一阁和嘉业堂相比,玉海楼的藏书特色鲜明。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玉海楼的研究,明显少于天一阁和嘉业堂。有鉴于此,笔者愿就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作一些探讨。

玉海楼是孙诒让之父孙衣言<sup>①</sup>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创建的,以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所编的类书《玉海》作为藏书楼之名,盖取《玉海》“为世宝贵而又无所不备”之意,希望玉海楼的藏书如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孙诒让继承父志,最终使位于较为偏僻地区的玉海楼成为声名远播之藏书名楼。孙诒让去世后由其子孙延钊<sup>②</sup>主管玉海楼。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廬,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学者。他不喜追逐名利,漠视仕途,朝廷多次请召,概不就职,一直潜居乡里,致力于朴学研究。孙诒让一生博览群籍,锐意治学,面广思密,著述宏富,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训诂学、校勘学、典章制度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章太炎对孙氏的学术成就评价甚高:“诒让学术,盖笼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诒让治六艺,旁通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揅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sup>③</sup>这是天一阁和嘉业堂的主人远远无法相比的。同时,孙诒让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密切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富有强烈的爱国之心,长期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成绩卓著。凡此种种,都对玉海楼的藏书特色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玉海楼藏书中也不乏珍本秘籍,但这并非玉海楼藏书之特色。如果仅就善本而言,玉海楼不但与天一阁、嘉业堂差距较大,而且也比不上同时期湖州陆心源的皕

①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逊学老人。晚清著名学者和古文辞家。

②孙延钊(1893-1983),字孟晋。曾任温州籀园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编纂,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③章太炎:《孙诒让传》,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

宋楼和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然其特色却是五者中最鲜明的。笔者认为,玉海楼的藏书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藏有大量温州地方文献。清光绪三年(1877)孙诒让随父宦游江宁(今南京)时,曾撰《徵访温州遗书约并叙》传布海内,广泛求购或求抄下迄明、清两朝之乡贤遗著,并指定高人,于各地分司其事,从事搜访,努力做到“凡先哲著述,片纸只字,罔不收拾”。经过多年积累,玉海楼的藏书多达八、九万卷,除了一般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外,还度藏了大量浙江地方文献,其中温州地区历代学者之著述尤为丰富,成为玉海楼藏书的最大特色。仅孙延钊于1935年所编的《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贤先哲遗书目录》,即收书460部,其中经部28种,史部52种,子部50种,集部221种,包括明刻本32种,明写本2种,稿本10种,传抄稿本1种,抄本210种,另有日本刻本1种。该目录分为内外编,内编收录温州乡贤之著述,外编则收录外地人有关温州文献之著述。“各书均著录撰人、版本、卷数、册数,或详叙流传原委,或校注各本异同,或旁及海内别本之收藏情况。”<sup>①</sup>上述书籍大多经过有关学者的批校,价值颇高。玉海楼所藏的温州地方文献中有不少珍贵之书,如原刻本[万历]《温州府志》、[崇祯重修]《泰顺县志》、[康熙]《瑞安县志》、[雍正特开]《玉环志》以及明万历刻崇祯补修本《平阳县志》等,其中[万历]《温州府志》系海内孤本。除了温州之外,玉海楼还藏有不少浙江其他府县的地方文献。由于古书难以收集,孙诒让就积极借抄他人所藏的有关地方文献,有时也与人交换副本,以广收藏。如清同治九年(1870),他曾借抄戴望所藏的卢文弨批校本《越绝书》。上述藏书,为孙诒让撰写《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温州建置沿革考》、《瑞安建置沿革考》和《永嘉郡记集本》等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编纂的《永嘉丛书》质量上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玉海楼的丰富藏书。可以说,玉海楼的藏书特色与孙诒让的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sup>②</sup>。《温州经籍志》乃孙诒让根据史志及各家文集,并兼采《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和《千顷堂书目》等编纂而成的。该书属于辑录体解题书目,共计著录唐至清代的图书1300余种,分类依照《四库全书总目》,并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注其存、佚、未见。孙氏在书名、卷数之下注明其出处及卷数变化,同时广泛辑录相关资料,并加上按语。该书考证精详,堪称浙江各郡邑艺文志中之精品,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人对其评价甚高,如姜亮夫指出:“此一书搜罗温州六县古今艺文,既精且博,是最有成就的目录学著作。……在清代的目录学中,像《温州经籍志》这样的书,几乎没有第二种。”<sup>③</sup>《温州经籍志》的刊行,大大方便了读者利用温州

①张宪文:《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文献》1988年第3期,第196页。

②陈东辉:《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第190-191页。

③姜亮夫:《孙诒让学术检论》,《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第95、97页。

地方文献,“影响所及,一时间辑一郡一县一邑艺文的纂著,先后继起,不愧为一郡文献之帜志”<sup>①</sup>。此外,孙衣言编有《永嘉书目》,著录书籍 1075 种,后刻入《永嘉丛书》中。永嘉县修新志时,曾聘请孙诒让为协修,他将玉海楼所藏的永嘉地方文献数千卷寄存志局,供修志人员参考。这批文献中的《瓯海轶闻》(孙衣言编)和《温州经籍志》,成了编纂新《永嘉县志》的最佳参考资料。平阳县新修方志时,孙诒让又提供了大量相关书籍。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跋》中云:“不佞与诸同事,假馆瑞安,尽阅玉海楼藏书。”该县志被认为是近代地方志中的佳本之一,玉海楼丰富的地方文献类藏书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新修瑞安县志时,也利用了玉海楼藏书。孙诒让还为此撰写了《瑞安县志局总例》和《瑞安县志局采访人物条例》<sup>②</sup>。

二、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之影响,藏书注重实用。玉海楼的藏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孙诒让的学术研究服务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温州地方文献之外,孙诒让的有关论著同样得益于玉海楼其他方面的藏书。众所周知,《墨子间诂》系孙诒让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俞樾称“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sup>③</sup>。孙启治在点校本《墨子间诂》的“前言”中指出:“作为一部集清代墨学大成的汇解性质的书,孙书保存了丰富的资料,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著的基础上完成的。”<sup>④</sup>为了撰写该书,孙诒让历尽艰辛,四处搜求,先后访得《墨子》的明吴文定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日本宝历间(1751-1764)仿刻明茅坤本,以及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杨保彝《墨子经说校注》等。可以说,假如没有上述珍贵版本,《墨子间诂》是很难完成的,至少要大为逊色。同时,孙诒让耗费 27 个春秋著成的《周礼正义》,集清代周礼学研究之大成,乃影响巨大的不朽之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章太炎曰:“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sup>⑤</sup>梁启超则认为“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sup>⑥</sup>。与此相应,孙诒让对于与《周礼》有关之典籍也是尽量做到收罗完备,仅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原杭州大学图书馆)保存的玉海楼旧藏中,就有明成化十年(1474)张瑄刻本《周礼集说》11 卷(元·陈友仁撰)、《复古编》1 卷(元·俞庭椿撰)、明嘉靖间刻本《周礼》6 卷(元·丘葵注并补《冬官》,明·顾可久编次)、清玉海

---

①雪克:《孙诒让学术要著述略》,《雪泥鸿爪——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132 页。

②参见陈光熙:《孙诒让的图书馆事业》,《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第 38 页。

③俞樾:《〈墨子间诂〉序》,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 2 页。

④孙启治:《〈墨子间诂〉前言》,孙诒让:《墨子间诂》,第 6 页。

⑤章太炎:《孙诒让传》,《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 389 页。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08 页。

楼据钱塘丁氏抄本传抄《周礼疑义》44卷(清·吴廷华撰,存18卷)、传抄本《周官记》6卷(清·庄存与撰)、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周礼汉读考》6卷(清·段玉裁撰)、清玉海楼据戴望写本传抄《周官指掌》5卷(清·庄有可撰)、清抄本《周官集说》12卷(清·庄有可撰)、清玉海楼据原刻重抄本《周礼注疏献疑》7卷(清·许珩撰)、清玉海楼据士礼居原刻传抄本《重雕嘉靖本校宋周礼札记》1卷(清·黄丕烈撰)、清抄稿本《周官说》(不分卷,清·佚名撰)、清聚奎楼刻本《考工记图》2卷(清·戴震撰)、清抄本《考工记集说》2卷(清·庄有可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原刻本《考工记车制图解》2卷(清·阮元撰)和清抄本《考工记考辨》8卷(清·王宗淩撰)。其中除了《周礼集说》、《复古编》、《周礼》、《周礼汉读考》和《考工记集说》之外,孙诒让均作了程度不等的批校或题识(或跋)。经笔者目验,从上述典籍中的批校、题识(有的经多次增补和修改)以及书的品相来看,孙诒让曾经反复阅读并经常使用这批图书。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藏书。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玉海楼的有关书目中虽未著录新学图书和报刊,但玉海楼却收藏了不少此类书刊。这一现象,与孙诒让晚年思想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孙诒让虽然是清代朴学之殿军,但他并不像有的朴学家那样皓首穷经,不问政治,而是主张通经致用,关心国家大事。早在光绪初年,他就开始留意西学著作。戊戌变法前后,他深感所学与时代不相适应,于是转而讲求新学,积极收集相关书刊。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经过上海时,专门到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科学书局和中国图书公司购买新书364册。此外,他还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撰写了《变法平议》40篇,提出革新政治的建议。孙诒让所购买的关于西方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世界史地以及国人讲求富强和变法改制等方面的书籍达2600多册,并在玉海楼楼下辟专室陈列。此外,他还长期订阅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实学报》、《外交报》、《万国公报》、《时事报旬刊》、《译书公会报》、《图书月报》、《政艺通报半月刊》、《东方杂志》、《教育世界杂志》,杭州的《白话报》,日本东京的《民报》等。另有友人赠阅的长沙《湘报》、《湘学新报》,日本浙籍留学生的《浙江潮》,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刊行的《新民丛报》和《清议报丛刊》等<sup>①</sup>。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时也是孙诒让及玉海楼不同于晚清绝大多数藏书家、藏书楼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藏书多名家批校本和稿本、抄本,其中包括孙诒让本人的许多批校本和稿本。玉海楼尤其注重收藏学术价值高的名家校本及未刊稿本,其中仅罗以智手稿本就有《宋太学石经考》、《金石综例跋》和《蔡中郎集举正》等3种,批校本有旧抄本《周易图说》、明刻本《华阳国志》和明嘉靖刻本《高士传》等14种。另有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金鹗的《求古录礼说》、宋保的《谐声补逸》等稿本。现存的玉海楼旧藏中,有钱曾、朱彝尊、黄丕烈、吴槎客、周松霭、宋

<sup>①</sup>张宪文:《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文献》1988年第3期,第192页。

翔凤、陈鱣、卢文弨、鲍廷博、顾千里、孙星衍、刘恭冕、吕光敞、戴望、罗以智等人的校语。对徵访所得之书,孙诒让往往加以批校题跋。玉海楼旧藏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藏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sup>①</sup>,且绝大部分系善本<sup>②</sup>。根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附编之一《玉海楼专目》统计,这部分善本

①不少论著中提到,玉海楼旧藏后来大部分归杭州大学图书馆(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收藏。其实这种提法并不符合事实。1951年,孙延钊将玉海楼旧藏约22000册捐赠给温州市图书馆,其中包括明刻本和名家批校本近200种。目前,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温州市图书馆的线装古籍藏书在浙江省地市级图书馆(天一阁除外)中均首屈一指,应该说主要得益于玉海楼之旧藏。瑞安县人民政府于1956年将玉海楼辟为文物陈列馆,并积极徵集和收购原玉海楼散出的藏书、文物、字画等入楼庋藏。现藏书已逾30000册,包括部分玉海楼旧藏,内中有孙诒让《墨子间诂》稿本卷10和孙诒让批校本《周礼郑氏注》、《墨子》、《墨子经校注》、《墨子斟录》、《淮南鸿烈解》和《黄文简公介庵集》等。玉海楼现有孙诒让纪念馆、民俗文物陈列室和临时展览室等,已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有少量玉海楼旧藏,其中上海图书馆藏有孙诒让稿本《墨子间诂》15卷(缺卷14)。比较确切地说,玉海楼旧藏中较为珍贵的善本目前大部分保存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尤其是孙诒让的稿本和批校本较为集中。而玉海楼原先收藏甚富的温州地方文献则以温州市图书馆庋藏最多,同时温图还藏有十分珍贵的孙诒让《周礼正义》、《温州经籍志》、《讽籀余录》、《补艺宦检书小记》、《论语正义补苴遗稿》和《永嘉瑞安石刻文字》等著述之稿本,以及孙诒让批校本《周礼总义》、《周礼学》、《周礼汉读考》、《礼笺》、《群经宫室图》、《春秋公羊传义疏》、《鲜虞中山国事表中山疆域图说》、《叶文定公年谱》、[隆庆]《乐清县志》、[乾隆]《温州府志》、《雁山志》、《东瓯掌录》、《泉志》、《东瓯金石志》、《鹖冠子》、《齐民要术》、《补修宋金六家术》、《后村居士集》、《安雅堂集》、《不繁舟渔集》和《瓯滨文录》等。

②这批图书是1947年孙延钊捐赠给国立浙江大学文学学院的(先寄存,后捐赠)。当时曾编有《浙江大学文学院收藏瑞安孙氏玉海楼寄存图书文物简目》1册(现存温州市图书馆)。所赠图书计465部,凡2003册,另有麦鼎、要君孟、汉五凤砖、至万世砖、元官印、四尺铜尺、“汲古堂志”四字款识端砚、石章等文物38件,商子孙父乙角、周王伯鼎、周金、秦权、汉镜等拓片202幅,《永嘉丛书》版片2460片,孙诒让墨迹21件,《籀庠手札》、《曲园手札》各1册。所赠图书,绝大部分是善本,其中宋版1种,元版7种,明版155种,影宋抄本8种,孙衣言手稿本1种,批校本26种,孙诒让稿本4种,批校本77种,别家手稿本3种,批校本20种。其中许多种类为《玉海楼善本书目》所未载(参见张宪文:《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文献》1988年第3期,第202页)。有多种论著提到这批图书文物后来归杭州大学图书馆(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作为特藏。笔者曾供职该馆古籍特藏部,专门仔细查找过这批图书文物,但除了本文提及的《玉海楼专目》中所收的384种图书之外,并未见到文物、拓片、版片、墨迹和手札。即使就图书而言,亦出入颇大。该馆所藏善本中,无宋版,有6部元版,741部明版,其中4部元版系玉海楼旧藏(参见拙作《杭州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古籍述略》,《书品》1992年第3期,第56页)。

共有 391 种<sup>①</sup>,其中经部 58 种、史部 96 种、子部 72 种、集部 147 种、丛书 18 种,包括弥足珍贵的孙诒让稿本 16 种<sup>②</sup>,即《经逢》节本(不分卷)、《辑周礼马融郑玄叙》(不分卷,附《山海经错简》、《商子境内篇释》、《唐代碑志目》)、《周易乾凿度殷术》1 卷、《古籀余论》1 卷、《古籀拾遗稿》3 卷、《商周金文拾遗稿》3 卷、《契文举例稿》2 卷、《广韵姓氏刊误》(不分卷,第 3 稿)、《广韵姓氏刊误》2 卷(第 4 稿)、《商周彝器释文》1 卷、《汉石记目录》1 卷、《温州古甓记》1 卷、《汉晋经籍录目》(不分卷)、《六历甄微》(不分卷)、《籀庾述林》(不分卷)、《籀庾述林》10 卷<sup>③</sup>,乃该馆善本书库的镇库之宝。该馆另有经孙诒让批校、题识、序跋、过录或写有浮签的古籍 88 种<sup>④</sup>。孙诒让对玉海楼中的

①根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统计,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现藏善本古籍 1350 种、1485 部,共计 15124 册,其中经部 156 种、167 部,凡 1126 册;史部 332 种、378 部,凡 5219 册;子部 198 种、219 部,凡 2527 册;集部 610 种、662 部,凡 2772 册;丛书部 54 种、59 部,凡 3480 册。就种数而言,玉海楼旧藏占 28.96%,其中经部占 37.18%,史部占 28.92%,子部占 36.36%,集部占 24.10%,丛书部占 33.33%。如果就质量而言,玉海楼旧藏对于该馆则更为重要。

②以前有关论著在提及杭州大学图书馆(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所藏的孙诒让稿本的种数时,均记为 22 种,《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也是这样著录的。除了本文提及的孙诒让稿本 16 种之外,该书目将《大戴礼记斟补》2 卷、《四部别录》2 卷、《荀子校勘记》(不分卷)、《籀庾述林》10 卷附《补遗》,以及另一种《籀庾述林》10 卷也作为稿本加以著录,其实前面 4 种系抄本,并且无孙诒让手迹;最后 1 种则是刻本。同时,该书目还注明藏有《经逢》手稿(不分卷)1 种。事实上,该书是指孙诒让以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所作的朱、墨批校。虽然批校有数百条,但相对于多达 184 册的《十三经注疏》而言,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还是作为孙诒让批校本较为妥当。

③在上述 16 种稿本中,《经逢》节本、《商周彝器释文》以及《辑周礼马融郑玄叙》所附的《唐代碑志目》全部系孙诒让手迹(这几种书字数均不多),堪称真正的孙诒让手稿本。其余各种则是孙诒让在别人专门为他誊抄的稿本上作校补,校补字数多少不一,其中《古籀拾遗稿》和《温州古甓记》校补较多,另外 10 余种仅有少量校补。

④这一数据是笔者以《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的有关著录为线索,一一查核原书而得出的结论。统计标准是,凡是留有孙诒让手迹的,均计算在内,其中包括内有孙诒让传抄戴望校语的典籍 2 种,即清乾隆间抱经堂刻本《春秋繁露》和清乾隆嘉庆间嘉善谢氏刻本《荀子》。此外,张宪文《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文献》1988 年第 3 期,第 188-209 页)一文之附录《现存孙诒让著作稿本及群书批校跋本皮藏情况见知录》,收录孙诒让稿本 21 种,批校跋本 59 种,颇有价值,但遗漏较多。如 59 种批校跋本中,目前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藏 27 种,温州市图书馆藏 21 种,玉海楼藏 6 种,国家图书馆藏 2 种,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各藏 1 种。仅就笔者寓目的浙大现存的孙诒让批校跋本中的子部书而言,即有《道德经校勘记》、《庄子》、《商君书》、《韩非子》及《识误》、《邓析子》、《尹文子校勘记》、《吕氏春秋》、《存愚录》、《斟补隅录》、《煊书》、《补汉兵志》、《乙巳占》、《易林释文》、《禅宗永嘉集》等是该附录未收的。

许多藏书进行了批校和考释,他“一生校诂古书不下百数十种”<sup>①</sup>。此乃孙氏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同时也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孙诒让以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所作批校多达数百条,其中《诗经》部分就有170余条(雪克教授已将这些批校辑录并整理成《十三经注疏校记》一书,于198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同时,他对黄以周《礼书通故》的批校有300余条,对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批注近500条<sup>②</sup>。此外,他的名著《札迻》即为校释78种古籍的学术笔记,计有校文1300余条。上述稿本和批校本,是研究孙诒让学术思想、成就以及生平经历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四、藏书向社会开放,同时还向外地学者、藏书家赠送或与他们交换馆藏图书。与当时大多数藏书楼不同的是,玉海楼从刚开始建立起,孙衣言在主观上就有向社会开放之意识。他亲自制订规约16条,内容涉及藏书之流通方法和保护措施等,公布于玉海楼之堂壁,并在《玉海楼藏书记》中有云:“乡里后生,有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者,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这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晚清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的瑞安中学师生经常到玉海楼看书,不少温州籍的学者在年轻时受到过玉海楼的泽溉。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戴家祥、王起曾寄住在孙家学习,玉海楼丰富的藏书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戴家祥对玉海楼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孙诒让乃其姨公,其治学领域颇有与孙诒让相近之处,在金文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晚年主编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金文大字典》,并为孙诒让的《名原》、《籀庠述林》和《古籀余论》校补多处。孙诒让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此外,孙诒让曾向章太炎、梁启超、叶菊裳和陈衍等赠送过自己的著作及家刻《永嘉丛书》。丁丙、俞樾、黄绍箕、汤寿潜和端方等均与玉海楼建立了交换图书的关系。王国维在上海旧书店发现的我国首部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就是孙诒让送给端方的<sup>③</sup>。同时,由于孙诒让及其玉海楼在学术文化界的名望,不少学者和友人亦赠书给玉海楼,其中大多系自撰之作,一般均有作者签名,弥足珍贵。现存玉海楼的《晒书目录》<sup>④</sup>和《经微室书目》<sup>⑤</sup>都专门列有“师友投赠”一类,赠书者包括曾国藩、俞樾、林鹗、何绍基、钱泰吉、方东树、徐鼐、张文虎、郑珍、刘恭冕、谭献等著名学者。

---

①雪克:《孙诒让学术要著述略》,《雪泥鸿爪——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26页。

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收录孙诒让批校227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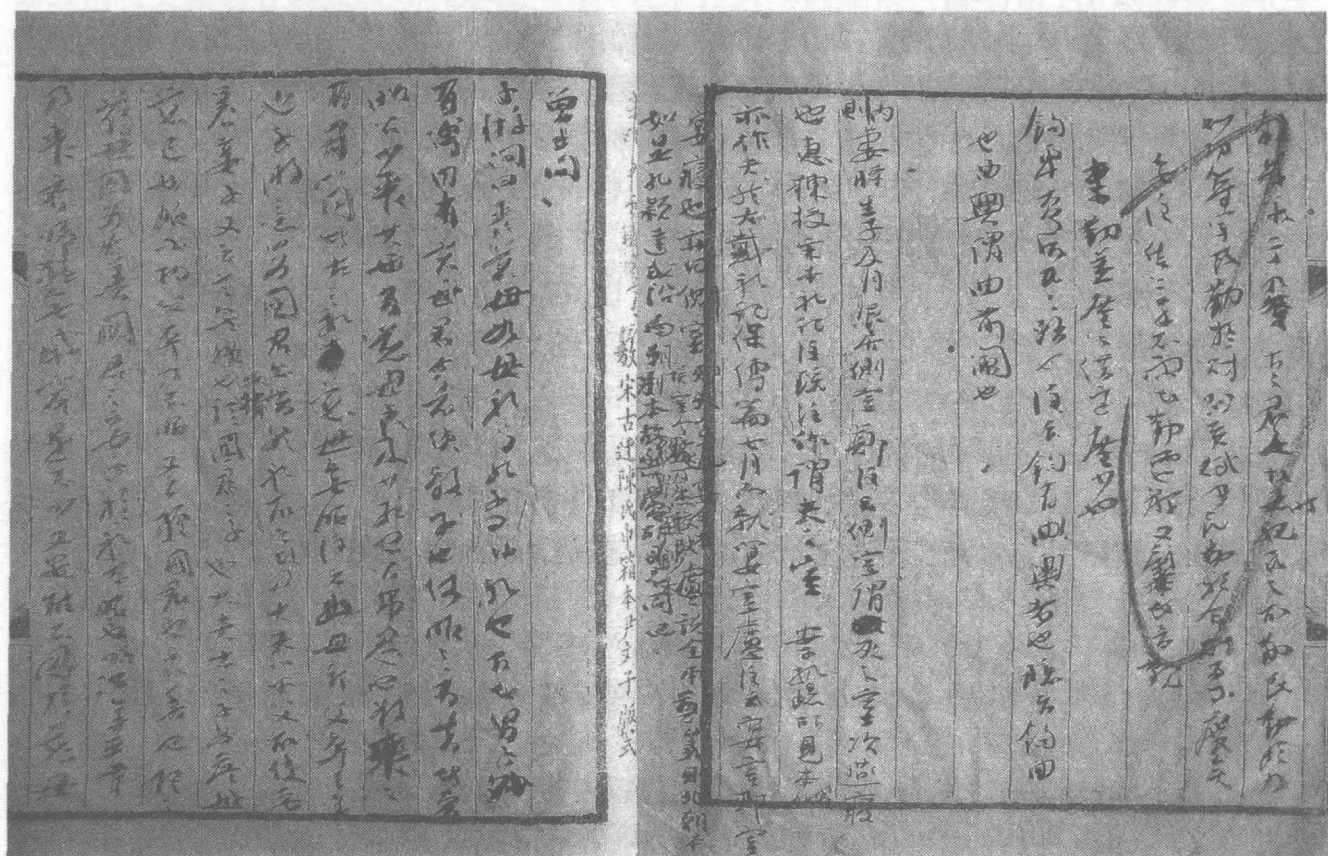
③参见陈光照:《孙诒让的图书馆事业》,《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38页。

④《晒书目录》乃孙衣言生前晒书时由他人登记之簿录,共计著录图书1052部,凡12761册。现藏温州市图书馆。

⑤《经微室书目》共计著录图书9830部,凡72421册。现藏温州市图书馆。

此外,孙诒让还办过一些小型图书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在瑞安普通学堂附设了“师资读书社”,社中备有与当时教学有关而教习私人无力购买的图书报刊,这些书刊中有一部分是从玉海楼调拨的。这个读书社实际上就是一所小型学校图书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1915年瑞安县公立图书馆成立时,孙延钊将玉海楼所藏的3600册古籍通行本、近代各种图书以及报刊杂志等,分批送给该馆作为基本藏书。

综上所述,玉海楼藏书堪称较为典型的学者之藏书,不同于一般藏书楼,更有别于书商。孙诒让虽然喜欢收藏古籍,本人也位居晚清著名藏书家之列,但他藏书之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学问和振兴地方文教事业,而并非为了鉴赏和把玩古董,更不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或牟取利益。笔者认为,玉海楼虽然建立较晚,但创办不久即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藏书名楼,除了本文论及的它的藏书特色之外,还与人们对孙诒让学问和人品的敬重直接有关。此外,中国藏书史研究者普遍认为,绍兴徐树兰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建成并于两年后向公众开放的古越藏书楼,是我国最早的私人创办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公共图书馆。其实,玉海楼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公共图书馆的气息,具备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



孙诒让稿本《经逐》书影之一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